



贸易政治学研究

Trade Politics

贺平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论 探索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机制	1
第一节 研究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意义	2
一、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机制	3
二、对外战略与贸易政策选择	10
专栏:世界各国的贸易促进机构	17
三、外交政策与贸易政策	18
第二节 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21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21
二、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	22
第三节 贸易政治学的研究框架	31
一、贸易政策与双层博弈理论	33
二、双层博弈理论的理论限度及其发展	35
专栏: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部门的设置	38
第一章 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40
第一节 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	40
一、社会交往与贸易起源	40
二、政治疆域与贸易界限	44
三、社会分工与贸易发展	48
四、交易费用与世界市场	50
五、空间制约与技术突破	54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国际贸易	65
一、贸易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65
二、产业革命与贸易的发展	69
三、贸易的全球化史	74

专栏:蔗糖的全球贸易史·····	78
第三节 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发展·····	81
一、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新发展·····	81
二、跨国公司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	94
三、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知识贸易·····	97
第二章 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政治经济学·····	102
第一节 比较优势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103
一、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	104
二、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	116
专栏:里昂惕夫悖论·····	122
第二节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124
一、重商主义及其理论主张·····	124
二、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130
三、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137
四、贸易保护主义的诸多理由·····	145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	153
第三节 机会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165
一、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	165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及其批判·····	168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	171
第三章 贸易与新现实主义·····	174
第一节 现实主义权力视角下的国际贸易·····	174
一、新现实主义与国际贸易·····	174
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国际贸易·····	176
第二节 贸易与霸权兴衰·····	179
一、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框架·····	180
二、霸权兴衰中的贸易因素·····	181
三、历史上的霸权与贸易·····	183
专栏: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与大萧条·····	198
第三节 案例分析:美日争霸与贸易摩擦·····	205
一、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	208

二、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	209
三、90年代中后期以后	210
第四章 贸易与新自由主义	212
第一节 复合相互依赖中的经贸因素	213
一、复合相互依存与新自由主义	213
二、复合相互依存中的国际贸易	216
第二节 贸易、和平与民主	217
一、贸易和平论	219
二、贸易民主论	232
三、对贸易和平论和贸易民主论的质疑	253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悖论	265
一、经济增长的奥秘	266
二、贸易:经济增长的引擎	272
第五章 贸易与依附论	286
第一节 依附论中的国际贸易	288
一、奥斯瓦尔多·桑克尔与依附性结构分析	291
二、塞尔索·富尔塔多与拉美经济停滞主义	294
三、安德列·冈德·弗兰克与全球贸易视角下的依附性积累	297
四、萨米尔·阿明与外国资本主义形态研究	300
五、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主流依附理论研究	306
六、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与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	309
第二节 依附论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渊源	314
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际贸易的阐述	314
二、阿吉里·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327
三、普雷维什—辛格假说与结构主义理论	329
四、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	338
专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346
第三节 依附性发展理论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崛起	348
一、传统依附论的发展困境	348
二、依附性发展理论的成功实践	356
第四节 世界体系论中的国际贸易	364

一、世界体系论概述	366
二、贸易与世界体系的诞生	367
三、贸易与世界体系的变迁	369
第六章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	374
第一节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建立与发展	374
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建立	374
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框架结构与运作机制	376
第二节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的国际贸易	378
一、关贸总协定与多边贸易自由化	378
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就与不足	384
第三节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389
一、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390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与基本职能	393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方式	397
第四节 作为国际组织的世界贸易组织	402
一、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402
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	410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发展回合	418
第七章 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贸易政治学	423
第一节 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	424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贸易因素	424
二、地区贸易安排在全球的兴起	437
三、地区贸易安排中的政治因素	441
第二节 地区贸易安排的理论与实践	447
一、欧盟与欧洲一体化建设	448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452
三、自由贸易区与东亚的地区合作	455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中的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	458
一、地区贸易安排:多边贸易体制的“绊脚石”	460
二、地区贸易安排: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	466

第八章 贸易的国内政治学分析.....	478
第一节 贸易摩擦政治化的内在机制.....	479
一、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	481
二、贸易保护的政治动力学	505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的外来压力与政策协调.....	519
一、国际经贸交往中的外压	519
二、贸易制裁与国际冲突	527
专栏:东芝事件	531
第三节 国际贸易谈判及其有效性.....	533
一、贸易交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533
二、贸易交涉及其有效性评估:美日案例的分析	535

导论 探索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机制

贸易或许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为古老的一种形式,也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类最早期的集体武装斗争就是为了确立对贸易路线的垄断地位、获得水资源以及排他性地使用牧草地。遍布希腊历史的无数次战争中,有许多都是为了确立贸易垄断权和控制商业水路。^①因此,制度经济学派的先驱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曾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冲突、依存和秩序”三项原则,而“交易”则是贯穿这三项原则的根本的活动单位,也是连接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的基本单位。如果说“商品”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交易”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把由交换产生的经济权力与胁迫(威胁权力)和说服(整合权力)一道,称为权力的三种形态。^③著名社会历史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权力由四个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这些权力既构成了“多重重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也是“达到人类目标的组织、制度手段”。其中,经济权力把两种社会活动领域整合在一起,一是“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界的积极干预”,即马克思所谓的“实践”,二是“使从自然界获取的物品进入流通和交换,目的在于转换形态和最终用于消费”,亦即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是经济权力的典型例子,体现出“弥散性”的权力。^④

在当今世界,贸易仍是全球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全球贸易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20% 大幅

① [加]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 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4 页。

②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73、144 页。

③ Kenneth Boulding, *Three Faces of Power*,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1989.

④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提升到超过 55%。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一大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加快了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步伐。以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开放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随着服务贸易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据世界银行估算,到 2030 年世界贸易有可能达到 27 万亿美元,而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增长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出口水平将提高 2 倍以上,从 2005 年的约 9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27 万亿美元以上。出口与产量的比率也将同步增长,从目前的 25% 跃升为 34%。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额将从约 3 万亿美元增加到 12 万亿美元以上。在一种更为理想的状态中,如果所有国家把交易商品(和国内农业保护)关税降低四分之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到 2030 年将增加 2 万亿美元,比基期水平增加 18% 左右。^①一言以蔽之,对于绝大部分国家而言,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还是部门层面的产业分布,抑或是企业层面的经营战略,都与贸易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一节 研究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意义

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曾将“经济分析”分为历史、统计、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四个组成部分。类似地,对贸易的研究也通常涉及贸易理论、贸易政策、贸易实证研究三大部分。因此,国际贸易固然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却也是国际政治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时常探讨的领域。贸易思想或贸易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经贸学说的阐述,还往往带有强烈的政策含义。^②早在古典贸易理论诞生的时期,很多贸易理论就是通过小册子的形式发布的,其作者除了学者之外,还经常包括商业公司等利益集团的代表、冒险家乃至普通的作家。这种著书立说的目的主要在于创立、修正或反驳与贸易或工业有关的某一思想,并进而对王公贵族或国家政府产生政策影响。这或许也可以视为贸易背后政治运作的早期形态。因此,对于贸易政治学的分析既要剖析种种贸易理论背后的理念和思想渊源,也要分析贸易政策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及

① 世界银行编:《2007 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版,前言第 XVI 页、第 46 页。

② 从国际经济的学科视角对国际贸易理论和概念的概要概括可参见 William A. Kerr and James D. Gaisford, eds.,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Edward Elgar, 2007。

其运作机制。

一、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机制

“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内政治”^①，“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经济”^②。任何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都“嵌入”在一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从个人到国家，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购物到国民经济长期计划的制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网络的制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指出，如果把财富定义为“通过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换，需求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把权力视为“对其他行为者的控制在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那么，“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活动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③基欧汉赞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对于17世纪重商主义理念的概括，即“财富是获得权力的绝对的基本手段”，“权力对获得和保持财富是基本的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恰当的终极目标”。他尤其强调，“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一时有必要为了军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长远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④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曾提出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三组关系，即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探索贸易与国际政治互动的机制，就是要将贸易政策的酝酿、制定、实施和评估放到国际与国内互动的框架之中，既要看到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国际层面的贸易交往，又要深入国家这一“黑匣子”内部探寻究竟。琼·斯佩罗(Joan E. Spero)归纳了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的三种形式，^⑤以下结合国际贸易的实例做一阐述。

1. 政治框架制度决定利益分配

政治框架制度决定利益分配。一国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选举制度、特

① Thomas P. O'Neill, *All Politics Is Local: and Other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② Peter F. Drucker, "Trade Lessons from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Vol. 73, Iss. 1, Jan/Feb 1994, p. 99.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

④ 同上书，第26页。

⑤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4.

殊利益集团利益表达机制、政策决策和实施体系等制度因素将对国际贸易形成重要的刚性制约。例如,一个国家如果实施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而非相对多数制(plurality election)选举制度,单一选区的规模较大,采用议会制而非总统制,且具有强势政党,则其贸易政策往往拥有较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稳定性,更有能力抵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选民压力。^①而在总统制下,强势总统往往能够更好地克服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偏见,实施较为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在发达民主国家是如此,在一些选举制的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②更一般地说,西恩·厄里奇(Sean D. Ehrlich)提出了“接入点”(access point)的概念。一个接入点就是一个相关的决策者,该决策者或是独立的,或服务于明确的政治选民群体。由于支持贸易保护的群体通常比自由贸易主义者更能够克服集团行动的困境,所以接入点越多,决策者受院外游说的影响越大,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反过来,决策者受利益集团的牵制越少,制定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厄里奇对战后发达民主国家关税政策研究后还发现,政府内部政党数量越多,选区越多,政党内部纪律性越低,该国的关税就越高。^③

不同国家在制度框架上的差异往往导致其对同一议题的不同政治应对。农业保护是贸易政治学的重点案例。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决策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业利益集团的“寻租”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以日本为例,农民较强的“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直接反映到日本的选举政治中。在1963年到198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农村选民占选民总数的比例与自民党得票比例之间的关联系数一直维持在0.6之上,1983年升值达到0.726。^④通过广泛的农业扶植和保护政策维护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成为自民党延续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日本政府获得合法性、认同度、向心力的重要保障之一。

① Ronald Rogowski, "Trade and the Variet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2(Spring, 1987), pp. 203—223.

② Daniel L. Nielson, "Supplying Trade Refor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Liberalization in Middle-Income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3 (Jul., 2003), pp. 470—491.

③ Sean D. Ehrlich, "Access to Protectio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rade Policy in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1, No. 3(Summer, 2007), pp. 571—605.

④ Aurelia George Mulgan,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348.

对于同一国家而言,随着国内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变迁,也可能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例如,出于对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和1929年至1933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的反思,美国在1934年通过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中将原本属于国会的贸易决策权限授予总统,^①战后的美国总统仿佛拥有了“帝王般的权力”^②。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一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而领导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国内根源。1949年的《出口控制法案》(The Export Control Act)使行政部门有权将贸易作为国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在1974年的《贸易改革法案》(Trade Reform Act)中,国会又授予行政当局“快车道”(fast-track authority)的职权。但是,1969年和1979年《出口控制法案》被《出口管理法案》(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取代,这一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放宽对国家安全出口控制的管制,限制出于外交政策目的而使用经济制裁手段。^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国会对贸易决策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在贸易问题上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渐趋保守。^④从机构设置来看,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角逐也成为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⑤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当出现分治

① 对于《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出台背后美国外贸决策的机制变化及其对之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影响的研究可参见 Michael A. Bailey, Judith Goldstein, and Barry R. Weingast,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Politics, Coal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Apr., 1997), pp. 309—338.

②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③ [美]迈克尔·马斯坦多诺:《学术与治术中的经济与安全》,[美]彼得·卡赞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美]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④ 对于美国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对外贸易中决策权的各自变化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参见金灿荣:《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7—30页。

⑤ 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研究可参见孙哲、李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85—106页;Marcus Noland, "Chasing Phantom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T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365—387; Steve Dryden, *Trade Warriors: UST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for Free Tr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ichael P. Ryan, "USTR's Implementation of 301 Policy in the 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3 (Sep., 1995), pp. 333—350. 对于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研究可参见 Judith Goldstein and Stefanie Ann Lenway, "Interests or Institutions: An Inquiry into Congressional-IT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 1989), pp. 303—327; Wendy (转下页)

(分立)政府而非联合政府时,即总统和国会多数派分属不同政党时,总统所享有的贸易决策权受到的掣肘就相对较大,美国的贸易政策就相对更趋保护主义。一言以蔽之,国内的政治分化和机构设置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

2. 国际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相互影响

国际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相互影响。这一规律突出地反映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政策采购、贸易制裁等诸多案例中,在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安全、外交等非经济因素起到了间接而又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取代前者成为首要考量。例如,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1946年12月驳回关税委员会的裁决,反对提高对深海鱼类的关税,为的是维持美国与冰岛的关系,对冰岛允许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投桃报李,也防止冰岛因渔业贸易的纷争转投苏联的怀抱。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在冷战时期明确指出:“全球防务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全球贸易。必须坚决抵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滥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国际贸易被称作是‘和平的经济渗透手段’以及‘不流血的革命’。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发挥这股力量的作用,通过贸易把自由世界团结为稳固联盟,决不给俄罗斯人留下这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②2007年,布什总统在卸任前夕,强烈呼吁国会批准美国与哥伦比亚在2006年2月签署的FTA,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通过开放本国市场、扩大两国经贸交往回报哥伦比亚政府在贩毒禁毒斗争中对美国的大力支持。

(接上页) L. Hanse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1 (Mar., 1990), pp. 21—46; Wendy L. Hansen and Kee Ok Park, "Nation-State and Pluralistic Decision Making in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2 (Jun., 1995), pp. 181—211; James M. De Vault, "Congressional Domi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Public Choice*, Vol. 110, No. 1/2 (2002), pp. 1—22; Omer Gokcekus and Amber Barth,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 S. Temporary Duty Suspension Program: An Empirical Note," *Public Choice*, Vol. 131, No. 3/4 (Jun., 2007), pp. 345—350.

① Susanne Lohmann and Sharyn O'Halloran, "Divided Government and U. S. Trade Policy: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4 (Autumn, 1994), pp. 595—632.

② [美]詹姆斯·R.施莱辛格:《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韩亚军、李韬、陈洪桥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6页。

贸易安排背后政治意图与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的现象还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例如,二战之后各主要大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经常要求受援国运用所得资助购买捐助国生产的产品(见表 0.1),用于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政府采购就成为小麦、面粉、奶制品等美国农产品的重要销售出路(见表 0.2)。无论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援助欧洲复兴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支援第三世界的“争取进步联盟”,此类事例并不鲜见。根据 2001 年经合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在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中,美国 and 西班牙的“非约束性援助”(“untied aid”,即不要求必须用于购买捐助国产品与服务的援助)占援助总额的比例不到 25%,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奥地利的比例也仅为 25%—50%。^①

表 0.1 1965 年由美国援助支付的物资的出口额^②

货物类别	美国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	美援支付的物资 出口额(百万美元)	美援支付的物资 出口额所占的百分比
机器设备	6 302	333	5.3
钢铁制品	689	168	24.4
化学制品	2 037	112	5.5
汽车、引擎和部件	1 927	91	4.6
肥料	230	70	30.4
有色金属	625	72	11.5
橡胶及橡胶制品	344	33	9.6
石油及石油制品 (不包括汽油)	483	36	7.5
棉纱(纺织纤维)	571	31	5.4
铁路运输设备	146	43	29.5

资料来源:查尔斯·海森和艾伦·斯特劳特:《对外援助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哈佛商业评论》1968 年 1—2 月号,第 71 页。

① OECD, “Untying Aid to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Policy Brief*, July 2001, p. 4.

② [美]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伍仞译,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139 页。

表 0.2 1955 年到 1966 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①

	金额(单位:10 亿美元)			比 重		
	总额	由政府付款的出口额 ^a	商业性出口额 ^b	总数	由政府付款的出口额所占的百分比 ^a	商业性出口额所占的百分比 ^b
全部农产品出口额	57.6	17.2	40.4	100	30	70
几种主要产品的出口额						
小麦和面粉	12.2	8.3	3.9	100	68	32
大米(碾过的)	1.7	0.7	1.0	100	41	59
棉花	8.0	2.6	5.4	100	32	68
奶制品	2.3	1.3	1.0	100	57	43
烟草(未加工)	4.4	0.6	3.8	100	14	86

注:a:这个项目只包括与经援和军援有关的两项具体计划项下的由政府付款的出口额;480 号公法的货值和共同安全(国际开发署)项下的货值。

b:商业性销售额中除了无补贴的商业性交易外,还包括一些接收政府补贴的出口货货值。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480 号公法项下十二年来的成就》,华盛顿,1967 年 11 月。

3. 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

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萎缩乃至消弭,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经济现象”(economic phenomena)事实上还包括“与经济相关的现象”(economically relevant phenomena)以及“受经济条件影响的现象”(economically conditioned phenomena)。②理查德·库珀(Richard Newell Cooper)提出,“贸易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在历史上,贸易议题经常“侵入”有时甚至主导国家间的高级对外政策领域。这一关系在战后初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曾被抑制了近 25 年,进入 70 年代之后开始重新显现。③苏珊·斯特

① [美]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伍切译,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140 页。

② [美]斯梅尔瑟、[瑞典]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第 2 版),罗教讲、张永宏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③ Richard Cooper, “Trade Policy i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9(Winter, 1972—1973), pp. 18—36.

兰奇(Susan Strange)等学者对巴西、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诸多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①他们鲜明地主张,“如果不关注国际贸易就不能完全理解或分析国际政治,反之,如果不关注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就不能完全理解国际贸易及其管理”。^②

20世纪70年代初期,很多人都在怀疑和忧虑美国贸易政策是否像20年代末一样面临着又一次重要的转向,世界各国是否又将迎来保护主义的高涨和贸易战的泛滥。尽管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美国的霸权实力也相对衰落,但这一担忧并未变成现实。正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所指出的,除了国际权力分配、国际机制、国内政治结构等因素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也成为重要原因。通过大量出口、跨国投资、产业间贸易等方式,各国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日益成为一个成本高昂的政策选项。^③

对国际关系中发展问题和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观的关注促使诸多国际贸易协议、机制和安排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外交涵义。例如,2000年6月,15个欧盟成员国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77个成员国签署《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取代1975年签署并先后四次执行的《洛美协定》,通过制定贸易和投资新框架以及一系列经济伙伴协议等措施,帮助非加太国家消除贫困,改善人权、民主和善治。美国也在同年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通过普惠制(GSP)等措施,帮助48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扩大纺织品、成衣等产业的国际市场准入,切实改善各国的出口境遇、经济状况和政治社会发展水平。

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交织有时还可能以较为极端和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在墨西哥最南端的恰帕斯州(Chiapas)爆发了萨帕塔(Zapatista)民族解放运动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这一组织旨在争取和维护土著印第安人权利,抵制北

① John M. Stopford, Susan Strange and John S. Henley,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沿第VI页。

③ Helen Milner, "Trading Places: Industries for Free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Apr., 1988), pp. 350—376.

美自由贸易协定,其斗争不但在土著印第安人中间得到了极大的支持,而且获得了墨西哥其他地区甚至国际上的声援。1996年,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萨帕塔丛林中举行了“支持仁爱、反对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国际会晤”。^①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级会议之外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更是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经典案例,自由贸易与保障人权、保护环境、政治民主、缩小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其他议题和政治诉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二、对外战略与贸易政策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模、方式、种类和收益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有关。例如,在国际贸易中,有时通过到岸价格(CIF)和离岸价格(FOB)报价的差来计算和衡量运输成本。CIF用来衡量在进入点的进口物品价值,FOB用来衡量在出口“港”运输工具上的出口物品价值。这两者之差表示了将货物从出口国运往进口国的成本。下表中列出的比值 $[(CIF/FOB)-1] \times 100\%$ 给出了运输成本的估计值(见表0.3)。一般来说,远离主要市场的国家(如新西兰)和被陆地包围的国家(如尼泊尔)的海运费用较高。被陆地包围的发展中国家比沿海的发展中国家的运输费用平均高出50%。鉴于贸易费用每增加一倍,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减少0.5%。而非洲大部分国家都被内陆包围,这也部分解释了非洲国家普遍较为贫困的原因。^②

表 0.3 以 1965—1990 年的 CIF/FOB 比率为基础估计的运输成本^③

国 家	运输成本(%)	国 家	运输成本(%)
澳大利亚	10.3	新西兰	11.5
奥地利	4.1	挪 威	2.7
加拿大	2.7	菲律宾	7.6
丹 麦	4.5	葡萄牙	10.3
法 国	4.2	新加坡	6.1
联邦德国	3.0	西班牙	6.4

① [美]查尔斯·蒂利、[美]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2页。

② [美]查尔斯·范·马芮威耶克：《中级国际贸易学》，夏俊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③ 同上书，第298页。